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新方志实践探索

王张强

提 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编纂新的地方志被纳入《1956—1967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自此，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起来，具有悠久修志文化传统的山西也开启了编纂社会主义地方志的实践探索。山西许多市县成立修志机构，抽调人员开展工作，掀起修志热潮并取得一定成果。尽管这一时期的修志实践存在很多问题，但在继承修志传统、创新修志理论、探索工作体制、保存文献资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后山西新方志编纂积累经验。

关键词：山西 新方志 实践探索

连续不断地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几千年来，薪火相传。从汉末魏晋南北朝开始，山西拉开地方志编纂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西开启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新篇章，尤其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山西新方志编纂逐渐形成全面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同全国一样曾进行新方志编纂的实践探索。

目前，学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省域层面新方志编纂历史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关于山西新方志编纂也有零星研究，但从整体来看还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基本情况比较模糊。《山西省志·社会科学志》载，“山西省有近十个县开展了志书的编纂工作”^①；《山西省志·附录》载，“山西省有寿阳、武乡、垣曲、神池、曲沃等 5 个县编写过县志”^②；《光明日报》载，“山西有 12 个县新修了地方志”^③。全省层面究竟有哪些县开展了修志工作、进展如何，众说纷纭。第二，成果数量统计不一。《山西省志·社会科学志》载，有 6 个县写出县志初稿或部分初稿^④；邱新立、王芳统计，有 7 部县志面世^⑤；任小燕^⑥、刘益龄^⑦统计，有 8 部新方志编辑刊印，30 余县基本完成初稿，近 50 个县完成部分初稿，其余少数县也收集了大量资料，但具体是哪些县，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明确。第三，首轮志书缺载误载。一般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首轮修志都会在志书中介绍本地修志历史。然而由于资料的限制，山西一些首轮志书并未对这一时期的修志历史进行记载。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可知，和顺、河津、神池、曲沃、闻喜、乡宁、襄汾、平定、五寨、武乡、襄垣、原平等地在这一时期有过修志活动，但未被首轮志书记载。此外，还有误载的情况。如《平顺县志》（1997 年版）载，“1961

①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12 页。

②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附录》，中华书局，第 796 页。

③ 《山西省新地方志编纂工作初见成效》，《档案工作》1981 年第 5 期。

④ 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第 212 页。

⑤ 参见邱新立、王芳：《中国五、六十年代地方志的编修始末及成果概述》，《中国地方志》2001 年第 1—2 期合刊。

⑥ 参见任小燕：《山西古今方志纂修与研究述略》，《晋阳学刊》2001 年第 5 期。

⑦ 参见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三晋出版社，2014 年，第 383 页。

年 12 月写出《平顺县志》”^①，但笔者核原志书初稿，完成时间应为 1960 年 12 月；《祁县志》（1999 年版）载，“1963 年 6 月《祁县志》（上册初稿）正式出版”^②，笔者核原志书初稿，出版时间应为 1963 年 8 月；《长子县志》（1998 年版）载，“成立县志编修委员会，至 1963 年，编出并刻写油印初稿 2 本……一本为‘长子革命斗争史略’”^③，笔者核原志书初稿，应为“成立县志整编委员会”，时间应为 1964 年 6 月 19 日，名称应为“长子县志（第二辑）人民革命斗争史略”，等等。第四，志书分析述评较少。对此时期新方志编纂的研究必须聚焦于志书本身，从全国层面来讲，现有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剖析，如对《六安县志》（初稿）、《奉新县志》（初稿）、《番禺新志》（初稿）、《昌黎方言志》、《怀来新志》、《泰兴县志》（初稿）、《吴江新志》（初稿）、《浦东县志》（初稿）、《石泉县志》（初稿）等的个案分析。这一时期山西新方志成果数量不少，且有像《陵川县志》（初稿）这样质量相对较好的成果，但尚未见到对某一志书的个案分析研究。

基于此，本文聚焦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新方志编纂，将其置于这一时期全国修志的大背景下，重点探讨其发展历程、时代特色、历史意义等，以期丰富当代中国方志史的研究。

一 山西新方志编纂的发展历程

1956 年，国家开始制订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及专家学者的大力呼吁下，编纂新的地方志被纳入《1956—1967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这个工作从 1958 年开始，先从一些有条件的县市着手，取得经验后逐渐推广”^④。自此，全国范围内的新方志编纂开展起来并掀起一个热潮，具有悠久修志传统的山西，也开启了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探索。

（一）山西新方志编纂热潮的兴起

1959 年 7 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编纂地方志工作，并成立由刘静山、景炎、尹伊、郭光轩、张颌 5 人组成的小组，起草并通过整理和编写地方志的方案。^⑤ 由此，全省范围内的新方志编纂逐渐开展起来。但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山西省志编纂工作似未实际开展，只有山西省地质厅编纂的《山西矿产志》在内部印发。^⑥

山西修志传统悠久，个别市县在新中国成立后自发地开展这一工作。总体来说，根据笔者掌握的比较明确的资料，从 1956 年至 1966 年，山西共有 51 个市县开启新方志编纂工作。其中，7 个市县完成部分志稿（见表 1），18 个市县编出完整初稿（见表 2）。现将新方志编纂基本情况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

表 1 山西新方志部分初稿统计表（1956—1966 年）

序号	县市名	志稿名
1	长治	《长治地理概况》初稿

① 平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顺县志》，海潮出版社，1997 年，第 546 页。
② 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祁县志》，中华书局，1999 年，第 737 页。
③ 长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子县志》，海潮出版社，1998 年，第 555 页。
④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56—1967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内部资料，1956 年。
⑤ 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第 212 页。
⑥ 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第 212 页。

(续表)

序号	县市名	志稿名
2	沁县	《建置沿革》初稿
3	侯马	《侯马市志》自然地理卷初稿
4	闻喜	《闻喜县志》(革命斗争史)、《闻喜县志》(革命烈士)
5	乡宁	《乡宁县志》地理篇
6	垣曲	《地理》《政治军事》《经济》《革命烈士名录》初稿
7	长子	《长子自然地理风土物产》《长子革命斗争史略》初稿
8	阳城	《阳城县志》前 9 卷初稿

说明：表中内容为笔者根据首轮、第二轮志书整理统计所得

表 2 山西新方志完整初稿统计表（1956—1966 年）

序号	县市名	志稿名	序号	县市名	志稿名
1	平顺	《平顺县志》初稿	10	芮城	《芮城县志》初稿
2	孟县	《孟县人民县志》	11	昔阳	《昔阳新志》初稿
3	临县	《临县新志》初稿	12	阳城	《阳城县志》初稿
4	陵川	《陵川县志》	13	五寨	《五寨县志》初稿
5	晋城	《晋城县志》	14	河津	《河津县志》初稿
6	祁县	《祁县志》	15	沁源	《沁源县志》初稿
7	襄垣	《襄垣县志》初稿	16	离石	《离石新县志》初稿
8	壶关	《壶关县志》初稿	17	静乐	《静乐县志》初稿
9	沁水	《沁水县志》初稿	18	原平	《原平县志》初稿

说明：表中内容为笔者根据首轮、第二轮志书整理统计所得

1956 年，长治市文史馆组织人员编纂《长治市志》，在写出《长治地理概况》等部分志稿之后，工作中断。^① 霍县（今霍州市）政协文史馆一些老先生部署筹划修志事宜，但未见结果。^② 同年，乡宁县成立文史研究馆，规定任务为收集、研究和整理县文史资料，只编出《乡宁县志》的地理篇。^③ 1957 年 8 月 19 日，平顺县召开县志编纂工作会议，组成编纂班子，历时三年写出《平顺县志》初稿 5 册。^④ 1958 年，天镇县人民政府抽调数名老教师、老职工筹划编写

① 参见长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治市志》，海潮出版社，1995 年，第 613 页。
② 参见霍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霍州市志》，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022 页。
③ 参见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801 页。
④ 参见平顺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平顺县志》，第 545—546 页；另有研究指出，“中共平顺县委于 1958 年 10 月开始编修，历时二年完成初稿并油印”，参见张松斌：《平顺县历代地方志编修述略》，《文史月刊》2023 年第 8 期。

《天镇县志》，后由于并县等原因，修志中断，收集的资料也多散失。^①同年，沁县人民委员会组织4名人员编纂《沁县志》，工作未开展即停止，4年后县政府重新设立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建置沿革》部分草稿。^②同年，榆社县文史馆馆员倡修新县志，并撰写新志卷目。^③

1959年4月，盂县开始编纂《盂县人民县志》，至9月形成初稿1册。后经校改审核于1961年12月印刷成书，全志共分5章41目，装订为1册；此后，县志起草委员会成员张锡珍又以章回小说的体例，编写出约10万字的《盂县志起草后话孟县》。^④同年，蒲县县长委托邑人曹文通编纂县志，后因主编病逝志稿未能全部完成。^⑤同年，临县编纂出《临县新志》初稿并打印成册。^⑥同年，垣曲县文史馆成立县志编辑部，编出《地理》《政治军事》《经济》《革命烈士名录》4编，共计32万字。^⑦陵川县成立县志编辑委员会，由下设的县志办公室和县文史馆负责具体编写，编出《陵川县志》初稿8册，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⑧

（二）山西新方志编纂艰难发展

1960年1月，阳高县委、县人委联合制订关于编辑新县志的工作方案，并组成编辑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政协文史馆合并办公，收集大量资料。^⑨4月，晋城县（今晋城市）成立县志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多编成《晋城县志》，内部刊印。^⑩同年，大同市文史研究馆着手整理民国县志，但随着大龄馆员的相继离世，修志工作夭折。^⑪同年，偏关县委根据晋北专员公署关于各县编写县志的指示搞试点，历时3个月便中止，此后决定再次编纂县志，工作班子建立一个多月，仅搜集编写部分资料。^⑫1961年，侯马市人民委员会成立市志编辑机构，下设市志编写办公室，组织力量征集资料，开展志书编纂，只留存自然地理卷草稿一章。^⑬同年，祁县县委、县人委组织成立县志编修委员会，责成专人编纂，计划分为旧祁县的面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历史人物和革命烈士传略4编，但由于经费、人力等原因，只完成第一、第二编的初稿，共计17万字，1963年8月以《祁县志》（上册初稿）正式出版。^⑭

1962年，岚县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曾动议编纂新方志，并且组织编写班子，整理旧县志，但工作未能坚持下去。^⑮7月，襄垣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出《襄垣县志》初稿，分为地史概况、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政治法律、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粮食、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交通邮电13章。^⑯同年，壶关县副县长主持编纂新县志，配备4名专业修志人员，共编写

① 参见天镇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天镇县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37页。

② 参见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沁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545页。

③ 参见榆社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榆社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32、716页。

④ 参见盂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盂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869、873页。

⑤ 参见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蒲县志》，方志出版社，2013年，第1016页。

⑥ 参见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县志》，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858页。

⑦ 参见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垣曲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65页。

⑧ 参见陵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陵川县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492页。

⑨ 参见阳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阳高县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714页。

⑩ 参见晋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晋城市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1497页。

⑪ 参见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同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225页。

⑫ 参见偏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偏关县志》，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786—787页。

⑬ 参见侯马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侯马市志》，长城出版社，2005年，第654、1067页。

⑭ 参见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祁县志》，第737页。

⑮ 参见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岚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740页。

⑯ 参见襄垣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襄垣县志》（初稿），1962年7月。

草稿4编18章。^①同年,闻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闻喜县志》(革命斗争史)部分印行,两年后《闻喜县志》(革命烈士)部分印行。^②芮城县以文史馆为主,历时两年编纂出《芮城县志》初稿,内容分9个部分,约3万字。^③1963年8月,太谷县(今太谷区)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拟订编写提纲,搜集到78万余字的资料。^④同年8月1日,昔阳县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昔阳新志》初稿分上下两册打印50套,分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但最终未定稿成书。^⑤12月,沁水县成立县志编修委员会,历时一年多编出《沁水县志》初稿。^⑥同年,阳城县委组成县志编纂委员会,至1965年底完成9卷初稿,约70万字,第10卷尚未编出即中止;与此同时,县一中教师王壁自行编纂《阳城县志》,约10万字。^⑦同年,五寨县文化局主编的《五寨县志》初稿印行。^⑧

1964年3月,河津县(今河津市)完成《河津县志》初稿。^⑨10月,沁源县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出《沁源县志》初稿。^⑩同年,离石县(今离石区)编出《离石新县志》初稿,分上下两册共8章,油印15本,约15万字。^⑪9月,静乐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一年后写出初稿,分“历史地理概况”“解放前社会经济概况”“解放前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烈士历史人物传略”,共计15万余字,油印几十本征求意见。^⑫同月,襄汾县文化馆制订《襄汾县志编修计划大纲》(初稿),开展修志工作。^⑬同年,长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写出《长子自然地理风土物产》和《长子县志(第二辑)人民革命斗争史略》,油印初稿2册,志稿未成。^⑭此外,原平县(今原平市)《原平县志》油印本面世。^⑮

这一时期,武乡、神池、曲沃、运城、山阴、岢岚、和顺、新绛、屯留、万荣、宁武、隰县、兴县、中阳、寿阳、高平等地都曾筹备编纂新方志,但均未能持续进行。

总体来说,尽管新方志编纂被视为一项重要任务,但总是受到阶段性中心工作的制约,因中心工作内容调整而被迫搁置或停止。此外,新方志编纂机构往往是临时设立,人员大多是临时抽调,一旦完成工作,机构即被裁撤,人员即被遣散或安排从事其他工作。如陵川县于1959年11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在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编写人员被抽调搞其他编写工作,很难坐下来坚持修志。^⑯这也导致新方志编纂难以持续进行。

① 参见壶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壶关县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第589、907页。

② 参见运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第877页。

③ 参见芮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芮城县志》,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247页。

④ 参见太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97页。

⑤ 参见昔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昔阳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738页。

⑥ 参见沁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沁水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73页。

⑦ 参见阳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阳城县志》,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656页。

⑧ 参见薛愈:《山西地方志目录汇编》,《山西地方志通讯》1980年第2期。

⑨ 参见河津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河津县志》(初稿),1964年。

⑩ 参见沁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沁源县志》,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698页。

⑪ 参见离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离石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

⑫ 参见静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静乐县志》,红旗出版社,2000年,第524—525页。

⑬ 参见襄汾县文史馆:《襄汾县志编修计划大纲》(初稿),1964年9月12日。

⑭ 参见长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子县志》,第555页。

⑮ 参见邱新立、王芳:《中国五、六十年代地方志的编修始末及成果概述》,《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2期合刊。

⑯ 参见王云鹏编:《我记忆中的陵川》,新起点印务有限公司,2005年,第375页。

二 山西新方志编纂的机构及人员

自隋唐确立地方志官修制度之后,历代修志没有中断,虽然也有民间个人或团体修志,但绝大多数都为官方主持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继承地方志这项我国独有的文化遗产,更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国家要求各地开展新方志编纂工作,希望每个县、市都有新修的志书。1958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下发《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方志编纂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意见》提出:“修志的组织应在各省、市、县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条件和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高等学校历史系与地理系、政府机关干部、中学教员、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科学研究机关、科普分会),自行进行决定”^①。

(一) 组织机构:以党委政府成立的专门修志机构为主

从全国来看,国家层面成立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以下简称“地方志小组”),指导全国修志工作^②;省级层面,北京、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青海、甘肃等地设立省(市)志编纂委员会;市县级层面,可大致分为省级地方志机构指导或负责市县志编纂,以及各市县自主设立修志机构两种情况,前者以湖北省为代表,后者则为全国绝大多数市县所采用。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一时期山西省志编纂工作并未启动,因此,本文将论述重点放在市县志编纂上。绝大多数市县都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设立专门的修志机构。这些机构名称不一,有“县志编辑委员会”“县志编修委员会”“县志起草委员会”“县志整编委员会”“县志编辑部”等。委员会主任委员或由(市)县委书记担任,如孟县;或由(市)县长担任,如离石县;或由(市)县委宣传部部长担任,如阳城县;或由(市)县人委副职领导担任,如壶关县。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均由(市)县各党政机关部门领导担任。委员会一般下设办公室,负责新方志的具体编纂及其他工作。也有不设专门修志机构,将这项工作委托社会人士进行的情况。如兴县文史馆委托本县王如星等人收集撰写县志资料;蒲县县委、县人委委托本县曹文通编纂新县志。同时,还有私人编纂新方志的情况。如阳城县退休且瘫痪在床的王璧在家中编写《阳城县志》;曾参与编写《孟县人民县志》的张锡珍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编成《孟县志起草后话孟县》。

(二) 编纂人员:以文史馆馆员的参与为例

从全国来看,编纂人员主要是机关干部、教师学生、文史馆员、社会人士等。山西新方志编纂人员也是这几个来源。结合山西特点,本文拟重点探讨文史馆员参与编纂新方志的情况。

文史研究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和关怀下,为安排部分有专长、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而设置的机构,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1959年2月19日,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各市、县成立文史研究馆的通知》(晋编议珺字第75号),明确提出:“为了整理编纂市志、县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全省各市、县均成立文史研究馆。主要任务是编纂市志和县志、研究整理当地革命文物和其他历史资料……馆员,由市、县人民委员

①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② 参见这一机构的设立及沿革情况,参见邱新立:《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沿革》,《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期;冯子直:《曾三同志主持编纂我国社会主义时代新地方志的实践和思想观点——纪念曾三同志诞辰110周年》,《档案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会就本市、县熟悉当地历史情况和一定编纂能力的人士中聘任”^①。这些老知识分子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编纂新方志的积极性也很高。他们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的变革与变迁，见证了新中国各方面发展的新面貌，修志热情非常高，通过撰写回忆录、召开座谈会、入村走访等方式收集大量资料，并编写出新志。

三 山西新方志成果的时代特征

地方志是记载一个时期内特定区域历史和现状的文献，历代地方志无不体现着编修时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和社会主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新方志编纂。《意见》曾对新修方志的目的、内容、断限、原则、体例等方面提出要求，此后，地方志小组陆续下发一些文件，推动了新方志编纂工作，当然也包括山西新方志编纂。

（一）编纂目的：以存史、教育、利用为主

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存史、资政、育人”的概念，但三者作为地方志的功能内蕴其中。在存史方面，孟县认为，“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孟县人民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有责任来大书特书，以留后人学之念之”^②。在教育方面，沁水县提出，编写县志就是要“饮水思源，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领导，怀念先辈为我们创业之艰辛，从而使我们珍惜革命果实……进一步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③。在利用方面，晋城县（今晋城市）提出，“了解情况是正确指导工作的客观基础，是党决定方针政策的根据。我们要做好一件工作，不但要了解当前的物质环境，而且要从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分析。县志正是为工作人员提供参考资料，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④。

（二）记载内容：以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成就为重点

1959 年是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196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40 周年，全国上下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市县把编纂新的地方志作为献礼。此外，在“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下，志稿虽然也记载当地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名胜古迹、风俗习惯、人物等各方面情况，但对自然地理和历史史实记载相对简略，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情况为主。

比如，《孟县人民县志》的内容包括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及发展变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重点。《静乐县志》（初稿）分为“静乐县历史地理概况”“解放前的社会经济概况”“解放前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烈士历史人物传略”5 编^⑤；《祁县志》原计划分为“旧祁县的面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历史人物和革命烈士传略”4 编。^⑥ 这些志稿以高涨的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中国发展成就，因而也带有比较浓厚的宣传色彩。

①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各市、县成立文史研究馆的通知》，《山西政报》1959 年第 4 期。

② 孟县人民县志起草委员会编：《孟县人民县志》，“序言”，太原印刷厂，1961 年，第 1 页。

③ 田同旭、张道德整理：《沁水县志逸稿》，“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 页。

④ 晋城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晋城县志》（初稿），“序言”，1962 年，第 1 页。

⑤ 参见静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静乐县志》，第 524—525 页。

⑥ 参见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祁县志》，第 737 页。

（三）体例结构：章节体基础上的“纵横交错”

从全国层面来看，新方志主要有平目体、纲目体、章节体等。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山西新方志基本上都是章节体，但又可以分为“横排竖写”和“竖排横写”两种情况。这反映出当时编纂人员并不能认识到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区别。

前者如《陵川县志》（初稿），即“分门别类按照历史的纵剖面进行编纂的，而每一门类一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为几个历史阶段或者分为几个问题加以叙述”^①。该志稿设沿革、地理、户口、物产、政权、党团、军事、群团、宗教、历代农民革命斗争、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食、财政、金融、教育、卫生、文化、人物杂记、大事年记26章。后者如《晋城县志》（初稿），其编纂采取“以编年史和记事史相结合的形式，以时间先后为主，兼采问题分类的办法，进行编写。基本上是由古代而近代，由近代而现代，一直编写到1959年，有些内容也涉及1960年”。该志稿的篇目设置为“在太行山顶上”（自然地理部分）、“富于革命传统的晋城人民”（历史部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名人暨烈士传记”“大事记”5部分。^②

（四）具体写法：夹叙夹议、前后对比

这个时期的山西新方志志稿基本上采取记叙文、记事体、叙事文，同时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抛弃了“述而不论”的写法，采用夹叙夹议的形式。个别新方志初稿还使用了文学笔法。如《陵川县志》（初稿）“名胜”部分，介绍“陵川八景”，文字生动优美，对“熊山吐月”的记述是“这座山两峰峭立，一峡居中，每当中秋，一轮皎洁的明月，恰从山峡的正中徐徐升起，宛如从熊山吐出一般”^③，极具画面感。此外，为了配合1958年全国兴起的诗歌运动^④，不少志稿插入大量诗歌民谣。

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新方志的教育功能，不少志稿采取“解放前后对比”的写法。《晋城县志》在记载工业建设、农业建设、财经贸易、交通邮电、文教卫生等内容时，都采用这种写法。

（五）体裁选择：图、表、照、录、记、传的灵活运用

这一时期的山西新方志志稿比较注重图、表、照、录、记、传等的运用。如《孟县人民县志》志首附“行政区划图”；《沁水县志》（初稿）用“大事记”的形式记载1912年至1963年的大事。

辩证地看，这个时期的新方志编纂和志稿本身也有一定问题。首先，在理论上不能把“史”和“志”区分开来，如孟县认为县志就是一本社会简史、自然简史和革命简史的综合史，因而采取历史分期的方法记述。其次，在记述内容上，空缺、不详细、不准确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存在。最后，在行文上，违背述而不论的原则，空话较多，等等。

四 山西新方志编纂的历史意义

这一时期，山西的新方志编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志稿质量参差不

① 陵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陵川县志》，第75页。

② 参见晋城县志志编辑委员会编：《晋城县志》（初稿），1962年。

③ 陵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陵川县志》（资料之一），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1963年，第85页。

④ 参见夏杏珍：《新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群众诗歌运动——“大跃进民歌”和“天安门诗歌”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齐。但其对修志文化传统的主动继承和对修志理论实践的积极探索,都是值得肯定的。

(一) 修志传统的继承

山西自汉魏南北朝时期出现地记开始,至今已有 1700 多年的修志历史,产生了一大批种类齐全、内容丰富、价值宝贵的志书成果。据刘益龄统计,有文献可考的山西旧志(1949 年前的各级各类志书)共计 865 种。其中,魏晋时期 5 种、隋唐时期 15 种、宋辽金元时期 70 种、明代 303 种、清代 394 种、民国时期 78 种。^①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权的不断稳固和国民经济的逐渐好转,山西一些市县基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自发地开展新方志编纂,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第一次编纂社会主义地方志热潮,使得修志传统得以继承。正因为山西具有这样深厚悠久的修志文化传统,部分市县才能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全国率先提出编纂新县志,其中寿阳县是全国第一个开展修志工作的县。^②一些专家学者如李百玉、李志敏、刘纬毅在改革开放后大声疾呼重视并开展地方志的编写工作,一些曾参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志的人员(如孟县的高大云、离石县的刘振华、兴县的王如星、太谷县的郭齐文、垣曲县的梁国干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继续从事方志编纂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筹备小组会议(1981 年 2 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1981 年 7 月)先后在三晋大地上召开。^③笔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西称得上改革开放后全国首轮修志的策源地。

(二) 修志理论的发展

首先,指导思想发生根本变化。旧志编纂都是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指导,即使清末民国时期出现“民志”主张,也未能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新方志编纂摒弃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修志观点,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尽管当时的志稿中存在一些问题,但基本上还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正如沁水县志编修委员会提出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政策路线为依据,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论述事物的历史发展变化”^④。

其次,记载内容进行重大变革。旧志偏重记载皇恩庆典、官师科甲、典籍法制、名宦人物等,而新方志编纂一改陈规,记载当地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风俗习惯、人物等各方面情况,尤其以当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为主。如《平顺县志》(初稿)分为“自然概况与历史沿革”“平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平顺人民斗争大事记述”“平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史”“社会改革”“国民经济”“社会福利和抚恤”“平顺人民的武装斗争”8 编 67 章。^⑤

再次,志书体例有所继承创新。这一时期的新方志在批判地继承旧志体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有所创新。如《沁水县志》(初稿)分“总述”“政治”“社会主义建设”“文教卫生”“艺文”“名人墨迹”“获奖集锦”“烈士传记暨烈士名表”“大事记”“志余”共 10 编,编下设 33 章,章下又分若干节;《襄汾县志目录》除前言外,“分概况”“自然地理”“政治建设”“经济

① 参见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三晋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

② 参见晋中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晋中市志》(第三册),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692 页。

③ 参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第 514 页。

④ 田同旭、张道德整理:《沁水县志逸稿》,第 1 页。

⑤ 参见平顺县人民委员会编:《平顺县志》(初稿),1960 年。

建设”“杂录”5编。除个别条目外,总体来说是符合志书体例的。

(三) 工作体制的探索

第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领导方面,山西绝大多数市县都在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下成立专门的修志机构,市县领导担任修志机构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在人员配备上,或抽调党政机关人员,或聘请本地社会知名人士;在经费保障上,给予聘用人员每月生活补助;在志稿编纂方面,邀请省、市、县领导提供历史资料、拟定编写提纲、撰写相关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在审核出版方面,采取一定审批手续,由县委审定。

第二是坚持群众路线。在时间紧、任务重、材料缺、人员少的情况下,全党全民齐动手编写县志。在资料搜集方面,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另一方面掀起广泛的群众性采访投稿运动,召开老干部座谈会,奔赴外省、外市、外县访问革命老前辈,走访年龄大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工商业者及旧政权工作人员,广泛征集整理旧志。在志稿编纂方面,“众手成志、分工编写”,拟定县志目录并公开印发,由各单位、各系统分工编写,由主编部门汇集整理。

第三是保证资料质量。新志编纂对旧志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采取审慎严肃的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新志对被旧志诬为“盗贼”的农民起义领袖进行“翻案”,把“宣扬德教、荒谬无稽迷信”的内容一律删去;对待档案也保持清醒的认识,“档案是取材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因为档案资料也有‘编造’的现象,不一定都能准确无误地反映现实”^①。此外,对口碑资料进行仔细甄别和认真研究,力求使入志资料真实可靠、准确无误,这种认识和做法在当时极其可贵。

第四是注重志稿审核。新方志编纂担负着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教育干部群众的重要政治任务,各市县党委对此高度重视。如陵川县志编纂委员会曾提出四步审稿法:第一步,编者写出草稿后,由全体编辑人员共同评审;第二步,草稿修改后,由各系统成立的审稿小组评审;第三步,修改后,由县委专门的负责人评审;第四步,经县委审查后,打印若干份由县内、省内不同领域的专家评审,以此保证志稿的政治质量和内容质量。

第五是探索形成制度。《意见》曾提出“应当考虑把修订方志形成一个制度”。山西个别市县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也进行了考虑。如孟县人民县志起草委员会将新编纂的县志命名为《孟县人民县志(第一辑)》,时任中共孟县县委书记赵锐在“序言”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县志,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为止。建议有关部门,每年积累资料,每十年编写一册,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为止”^②。

(四) 文献资料的保存

这一时期的新方志编纂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所搜集整理的资料和编纂的志书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有些资料和内容被后续志书部分或完全采纳。

第一,从资料收集整理方面来看,1961年10月,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在《山西文史资料》发刊词中提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地搜集和积累地方文史资料、推动资料撰写和研究工作,为将来编写地方志准备条件”^③。如太谷县(今太谷区)曾于1963年组织人员,历时三年多搜集整理了78万多字的资料,后工作中断。1980年县志编纂工作再次启动,这些资料被重新整理归档登记采用。

① 王云鹏:《我记忆中的陵川》,第377页。

② 孟县人民县志起草委员会编:《孟县人民县志》,第1页。

③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发刊词”,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页。

第二,从已编纂成书的志稿来看,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芮城县志》(初稿)对日伪暴行的记载、《平顺县志》(初稿)对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运动的记载,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离石新县志》(初稿)对离石解放前历史的记载非常详细,被后修志书评价为“内容丰富翔实,文笔流畅朴实,为后来续修县志积累了不少资料”^①。《沁水县志》(初稿)详细记载沁水县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发展,弥补了光绪志(1881)和《沁水县志》(1987)之间近代历史的缺失,其中对“沁水十大家族”的记载,是该志的重大贡献,遗憾的是这部分并没有被《沁水县志》(1987)充分吸收。^②《晋城县志》(初稿)不仅有许多记载被后志采纳,而且还能补后志之缺^③,并不如后志所言“标语口号充斥全书,不足为文献之征”^④。《陵川县志》(初稿),笔者曾将其与《陵川县志》(1999)进行文本对照,发现前者80%的内容均被后者采用,在许多章节中甚至是原文一字不动地被采用。《陵川县志》(初稿)对后来修志产生深刻的影响,称得上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精品,曾在1982年举办的北方八省地方志培训班上被列为唯一展品进行公开展览。^⑤

余 论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连接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下与未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兴起第一次编修新方志的热潮。据统计,截至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修志工作,其中250多个县编纂出初稿。事实上,此后还有不少市县陆续坚持修志,并取得一些成果。这次修志中断后,修出的志稿以及为修志搜集整理的资料也遭到破坏。这些志稿和资料能留存至今,殊为不易、非常珍贵。此外,受当时条件限制,志稿的纸张质量、印刷水平都较低,时至今日许多已纸张破裂、字迹不清,如果再不保护整理,恐怕就会更加难以辨识,从而导致史料失传、历史割断。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这些历史文献资料的抢救性地挖掘、保护和整理,刻不容缓。从全国来看,一些市县已经重新整理翻印了这一时期的志稿。山西的陵川县、沁水县也开展了这项工作。整理翻印这些志稿是我们延续历史文脉、坚定历史自信的集中体现和关键之举。正如《沁水县志初稿》整理者指出的,该志稿的发现及整理,使“《沁水县志》从古至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志书体系,沁水的古今历史,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代体系”^⑥。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编辑部)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离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离石县志》,第569页。

② 参见田同旭、张道德整理:《沁水县志逸稿》,第6页。

③ 参见晋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晋城县志》(初稿),1962年4月。

④ 晋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晋城县志》,第963页。

⑤ 参见王云鹏:《我记忆中的陵川》,第382页。

⑥ 田同旭、张道德整理:《沁水县志逸稿》,第6页。